

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李雪涛

—

提到中国的多元文化传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不论是司马谈所论述的“六家”,还是后来学者所谓的“十家”,都说明“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之后,少数贵族已经无法垄断文化知识。社会上涌现出大量游说之士,各类思想粉墨登场,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历史地看,老子、孔子生活在殷周之际,当时正值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强大的商王朝在周人的挑战下不久就灭亡了。正是周人建立的新制度,铸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在列国纷争、礼崩乐坏的大变局中,传统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及其神圣性,这就促使当时的思想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所在,并寻求新的解释。这也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能够实现突破的前提。突破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完全断裂,从孔子的学说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实孔子更重视历史的连续性。新视野是在批判传统、接续传统的过程中拓展开来的,从而也使历史意识获得了解放。正是这次突破,构成了中国的智者们终极关怀的觉醒。

在这之后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文化统一的浪潮中,儒家学说经历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朱熹、王阳明的“理学”运动,长期居于正统的地位。尽管如此,其他的文化传统并未因儒家的意识形态化而被完全淘汰。由于代表着多元的社会阶层,有其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交流方式,再加上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思想文化也并没有泯灭,相反,它们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主流的学术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中国文化所谓的“小传统”。各种文化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因而分别起着主导或从属的作用,从而使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其他各种文化都以完整的学派形式被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些源自轴心时代的思想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规范。

中国文化的源头本来就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才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传统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是因为这符合了中国文化共生共济、相互补充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各种思想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充满活力的竞争态势存在的,更以理解和宽容的方式展现出亦此亦彼的丰富性。而多元共存的局面才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持久不衰的动力所在。

实际上,很早以前,古典的儒家思想家就是把人作为一个多元的存在来予以展示的。

杜维明在总结这一点时写道:“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诗教的,是有社会性的,是有政治性的,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超越的,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这一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遗产。”^①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人一直被视为社会网络的中心点,而非孤立无助的个体。从个人这一中心点出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

儒家强调“入世”,以有为、进取为其主要精神,有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道家偏重于无为、退守的“遁世”态度;而佛家则追求来世的福报。换句话说,儒者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教导人们与社会和谐相处。道家却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教会人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而佛家却填补了儒、道两家所无法解决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儒、道、佛可谓对立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对立,又统一,并且不可相互代替。从它们的关系,可以大概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且赖以互补的多个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儒、道、佛相互配合,分别承担着独特的社会使命。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在对待事业时是儒者,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在闲暇时会成为一位哲人,享受大自然;在关系到人生信仰时,又会到佛寺中跪拜。林语堂在评价苏东坡时不无道理地写道:“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③以上事实表明,以来,中国的社会确是一个多种思想相互依存的多元社会。

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可谓文化多元发展的鼎盛时期。如公元一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因佛教的传入而更加丰富,唐代儒释道之间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大融合,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这些都说明了统治者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与国力的兴盛、文化的繁荣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汉族本身就是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非单一的民族形态。在中国文化中,“合”也常常成为极具特点的哲学概念和方法论。曾在印度留学17年之久的玄奘,曾在那烂陀写出过《会宗论》一文,用会通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的观点,来与当时著名的佛教论师师子光辩论。可见“合”的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之深。除了表示融合的“合”之外,儒家知识分子还进一步阐发了孔子“和而不同”中的“和”的观念,这在当代可以表现为文化的宽容和共享。冯友兰先生晚年就提出“仇必和而解”,^④强调“和”作为沟通的价值。

一个面积与欧洲相当的中国,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元性都应当说是一种常态。费孝通曾有感于此:“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⑤由于几千年来不断积淀以及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化的态势,也是

① 杜维明著、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② 《礼记·大学》。

③ 林语堂著、宋碧云译:《苏东坡传》,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页。

④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58—261页。

⑤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当寄希望于坚持多样性统一,才能不片面地强调和僵化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才不至于以论带史。同时,也不应当忽视统一性,盲目夸大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例外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文化的特殊性而否定人的基本价值的普遍性。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各种因素在多元化的总格局中进行竞争共处都是必然的。只有通过纵向、横向、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交叉比较,才能全面和公正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多元文化的中国传统,不仅具有自己的本土意义,同时也具有全球意义。它应当是 21 世纪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的重要资源,应当去开发和继承,并从中创造出新的价值。

二

在当代中国,有很多现象表面来看是中国与西方的问题,实则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换言之,许多看似地域上的不同,实际是时间上的错位。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顺利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形态,应当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

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指的是在空间上具有多样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并且内部因素相互之间一再发生关联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目前发展依然没有偏离多元文化的方向,而这种发展方向的基础是由传统奠定的。传统上各种文化就是共同发展,互利互惠,而绝非相互对立、倾轧的。这宛如一幅太极图式的互补态势,充分表明中国古代的多元文化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形态。

多元文化的主张在德意志历史上也同样存在。以德国 18 世纪末浪漫派的先驱赫尔德为例,由于启蒙时代所倡导的“宽容”的观念,使得赫尔德也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有所关注。他认为各种文化是平等的,并且各有其独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文化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承认各种文化和价值系统都具有潜在的无限多样性,它们同样有着终极价值,却不一定具有可供平行衡量的共同标准。^①

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交往,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呈现出多姿多态而又相互依存的多多样统一的局面。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和宗教、不同的文化生活,史无前例地交织在一起。我们首先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面前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与以往相比,人类意识深层的时空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同时,现代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同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引发了许多人生价值的错位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获益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等各种便利,同时也必须承受全球化导致的矛盾与痛苦。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判断,承认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文化和价值观,以普世性为前提,以文化的多样性破除自我的偏执和狭隘,因为单一封闭状态终要结束,开放和自由的时代才是人类的未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① [德]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4 Teile 1784/91])。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①

当今时代是各种主义、思潮、意识形态以及各民族文化共存的时代,已经很难听到上个世纪冷战时“谁取代谁,谁消灭谁”的声音了。既然不能相互取代,还不如谋求共存,和平竞争;既然不能取消差异,还不如求同存异;既然无法固步自封,还不如相互开放。是在文化的融合中提升自己,还是仅仅固守住自己的传统,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命运的历史性选择。全球化实际上加强了区域化、本土化、民族化以及多样化的趋势。个人的身份认同无疑是与自己的文化相连的,全球化容易使人丧失家园和私人空间,赖以生存的文化于是成为人们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会格外注重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尽管目前在全球中具有影响力的基本价值观大都来自西方,但并不能将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精英思想视为普世性文化,这样的看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马克斯·韦伯所谓“近代的普遍性只有在欧洲才存在合理性”^②的论断愈来愈多地遭到包括欧洲学者在内的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③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共同价值取向,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参与、创造。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具有人的共性,其次才是其所属的民族和文化的特性。实际上,非西方文明并非总处在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上,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化是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那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文化共同参与到了对全球化的塑造之中来,不同民族的人既是普世价值的认同者,也是创造者。这是一个各种文化多样共存而又不断互动的过程,同时又帮助人们超越、克服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心意识,使人力求重新认识边缘文化的价值,倡导普世的伦理和道德体系。人类普世性价值观念形成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来源,中国的多元文化传统,无疑能为普世性价值提供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

尽管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科学主义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我们也不应当因此而拒斥对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接受。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从西化到现代化再到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几乎每一步都是被迫的,很少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由于被西方奴役和殖民的历史,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常常采取拒斥的态度,拒绝认同普世性价值,而更愿意去揭露所谓的西方阴暗面,这就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和自我民族特殊论的陷阱。“有几千年文化积累的大国,虽然有百余年的屈辱史,但不应该让狭隘的报复心理或者夺权的心态主导。”^④那种问题显然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压抑与自卑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如果不克服那种心理障碍,我们就难以以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当今的世界大潮之中。

普世性的文化当然不应该导致文化的单一化和趋同化,而应该是多元化。只要有多

① 钱钟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②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Vorbemerkung. (UTB für Wissenschaf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GmbH & Co. K, 1988. 9. Aufl. S. 1.

③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9. 高坂史郎著、吴光辉译:《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第51页。

元化存在,就会有各种文化观念上的差别。差别可以形成冲突,而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有序化和合法化,最终形成多元共存的争鸣局面。文化的差别和冲突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人类能够保持思想常盛的营养源泉。如果文化间没有差别的话,那也就没有交流的必要。实际上,文化的差异是根本的、持久的,也就是说,多样性是一种常态。对差异的宽容,是文化间进行交流的第一步。全球化时代的多种文化共生共存是一个多主体互动,同时又不断生成新的文化传统的过程。这一既具有鲜活生命力又具有普世价值的多样性,是我们今天应当极力维护的。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也会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文化的多样性是普世性赖以发展的基础,正是多种文化的共生共存,不断地为普世性提供着营养。

文化帝国主义是跟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背道而驰的。顾彬认为美国汉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除了注意吸纳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以及将英语变成唯一的科学用语之外,“美国汉学所取得的第三项巨大成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一种科学的讨论方式,这是一种反形上学的,也可以说是反欧洲的讨论方式。今天,任何一位想有所建树的中国学学者,都必须用英文发表其有关中国的论著,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词汇和思维结构屈从于美国的主流思潮。”^①美国所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他们的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各民族本土文化,从而使多样性失去意义。如何让启蒙以来的文明真正呈开放多元的态势,而不是狭隘的某一国文化霸权,这是摆在今天各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

各种文化之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必然也存在一些共性,这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能共存的原因所在。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传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面对多种文化共存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一种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他者)的碰撞和比较中,才能欣赏到他者的价值,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特性。

三

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生活节奏的变快,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现代文明同样给人们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隔膜感,引发了人们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危机,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导致人们失去心理平衡,乃至失去自我控制。财富的增加并不必然给人带来福祉,也可能引发两极的分化、社会的不公。多年来,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忧郁和不满中探寻着文化和自我的出路。在这些方面,多元传统的中国智慧是否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呢?

在世界各种文明都在极力展示自我之时,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无疑具有新时代的许多启示性的本质特征,因为唯有在与其他文明的融合和竞争之中,文化才可能得到辩证的发展与提高。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纲领:亦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四大步骤中,“输入学理”便是要引进异域(当时主要指西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目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经过改造的中国文明,亦即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按照胡适当时的

^① 顾彬为《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所写的序,见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顾序”第1页。

理解,输入学理的重要性,在于在认识和接受这些普世理论的同时,反省、更新自己的文化,为的是重新确定中国文化作为主体身份的价值和位置。今天来看,“输入学理”的深层含义还在于认同和接受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胡适并不认为这种认同意味着为西方所同化,而是本土文化的“再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逐渐地恢复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使之适应于世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胡适的纲领除了起到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的作用外,也为解决文化出路问题提供了中国的基本经验。

在具体处理文化多元发展的方法方面,孔子所提出的推己及人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是最佳的途径:对于我来讲是最佳的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讲未必是最恰当的选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意志强加于他人,因此以否定的形式来表达的“金律”,更具有人类相互间体谅的情怀。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明,①只要存在着文化的冲突,任何民族,不论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有多么强大,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给别人。

没有哪种文化是尽善尽美的,唯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自我的文化才具有活力。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多元文化的传统由历史转为现实、由区域性价值标准转而成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后,这明显地表明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传统是我们丰富的历史遗产,今天也成为全新的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与单一的文化发展观相比较,多元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显示出其愈来愈多的优势。同时,多元文化的并存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个重要启示,亦即文化间的相互宽容。“怎么样在多元的世界通过容忍、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对话来发展一种新的人文视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作重要的资源,从一种批判地了解,到重新解读,重新开发它的资源,即成为所有的人文学者必须担负的重要任务。”②各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乃至重构,都需要克服文化偏见与文化歧视。宗教战争、文化冲突、民族仇恨的产生都与文化间的不宽容有关。人类需要和平发展,除了互补的多元共存之外,别无他法。

四

2006年底,在我担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一职之后,曾到波恩附近的 Sankt Augustin 拜访了《华裔学志》的主编、汉学家马雷凯教授,就孔子学院可能展开的文化讲座方面的内容,征求他的意见。马教授认为,如果能组织一个有关多元文化的中国传统的系列讲座的话,对中等水平以上的德国公众来讲,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自17世纪以来,耶稣会有关中国的报告,给人一种误导,使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以为中国只有儒家的传统。确实,自西汉以来,对中国精英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文化特征,以及汉族的主要文化习俗,同时也决定着对待其他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单一的儒家传统。当时组织一系列这样的报告的目的,就在于以此来纠正来华耶稣会传教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②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序”第3—4页。

士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传统理解的诸多偏见。同时,中国文化的多元传统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至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依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要想深入了解当代中国,也必须要对多元中国文化的传统有所理解。

此外,这样的系列报告在东亚(主要是日本)文化本来就占据重要一席的杜塞尔多夫举办,也充分体现出了文化间接触和交流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在对话中,文化的多样化才能得以呈现。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普世性,也只能在文化的多元化中产生,绝不可能产生于单一化和趋同化之中。儒家传统在东亚的兴起,向我们揭示了传统在现代性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目前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过程,已经证明了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现代化包含了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的多重版本。”^①同时,多元的中国文化传统对回应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杜维明所提出的,“对西方启蒙以来的价值能否作出创建性回应”的问题。^②我们要学习西方,而又不放弃对自我文化资源的认同,学会对他者文化的敬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忠实。只有经过现代转换的中国文化,才能更过地涉及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才能更加具有理论特征的思辨。在儒家传统的现代化和当代价值方面,德国汉学家罗哲海教授做了很好的尝试。顾彬教授则以散文的形式,以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冯铁教授驰骋于两千多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不同朝代(时间上)和不同地域(空间上)都呈多元之态的文学传统。施寒微教授对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传统作了阐释,并揭示了这一传统对理解当代中国人思维的意义所在。我们有责任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对传统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以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思想的对话。只有在接受普世化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我们才可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与现代人类社会准则相悖的现象,从而发掘出自己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从多元的中国文化传统出发,构建一套能够容纳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新的话语系统,使中国文明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冯友兰先生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对当时西南联大的学风作了描述:“同无妨碍,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③多样性不仅是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我想,冯先生对当时西南联大多元学术并存的描写,也应当是今天全球化多元共存的理想。

(作者通讯地址: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100089)

(责任编辑 晓文)

①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第75页。

② 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